

从“对抗”到共同的“盟约使命”： 犹太教正统派与天主教对话的态度转变

王喆慧*

【摘要】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来,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教正统派对与天主教神学对话的态度一直是消极和对抗的。这主要受到拉比索洛维奇克的思想的影响。这种消极态度直到 2015 年《我们的时代》宣言(第 4 号)发布 50 周年之际才彻底转变。犹太教正统派发布的两份文件《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和《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标志着犹太教正统派改变了之前消极的态度,准备积极投身与天主教的神学对话,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关系进步的又一标志。

【关键词】犹太教正统派;天主教;对话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会议”)于 1965 年 10 月 28 日发表《教会 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又称《我们的时代》宣言,是天主教与犹太教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两教关系和解与对话的开始。面对天主教发出的对话邀请,以色列和美国的正统派犹太人反应冷淡,直到 2000 年之后,他们才对与基督教对话有了更积极的反应。2015 年和 2017 年犹太教正统派分别发布的《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和《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两份文件标志着犹太教和天主教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试图分析和梳理以色列和美国正统派犹太人反应冷淡的原因以及从“对抗”到建立共同的“盟约使命”的态度转变的过程,并对《我们的时代》发表以来犹太教正统派与天主教对话所取得的进展做一个总结。

* 王喆慧,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一、以色列正统派犹太人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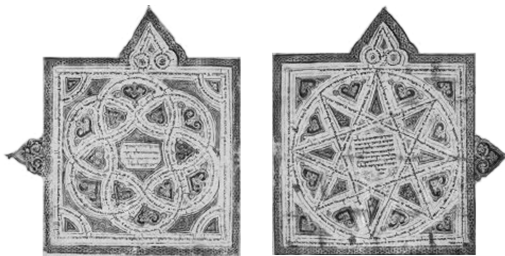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首先,以色列犹太人对梵二会议和《我们的时代》文件的反应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梵二会议召开时,以色列国建立仅15年。虽然以色列在1948年赢得了“独立战争”,但是直到梵二会议之前,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巴勒斯坦地区,此时的以色列需要大规模的移民和资金来支持国防和国家建设,以确保国家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生存下来。所以,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两次战争的年轻国家来说,国防和国家建设在犹太人心中占有优先权,与梵蒂冈和天主教的接触在国家日程上并不占据主要位置。^①而梵二会议召开前,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则占据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全部注意力。审判同时加强了犹太人是受害人,基督徒是压迫者的心理,因此以色列犹太人并不关心天主教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们的时代》宣言发布以后,希伯来语期刊 *Prozdar* 刊印了宣言全文,期刊中的一篇文章评价道:天主教会态度的改变使犹太教面临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抵御一个怀有敌意和带来迫害的教会的影响比抵御一个友善的教会的影响要容易得多”^②。教授莱波维奇(Leibovitch)的文章表达了更加消极的看法:“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良心必然会渴求犹太教的完全毁灭,而同样,一个好的犹太人的良心也会憎恶一切与基督教有关的事物。基督徒和犹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存是不可想象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对话毫无用处。如今天主教会认为减轻对犹太人的‘弑神罪’的指控是一个高明的手段……以此来恢复在犹太人中的传教活动。”^③莱波维奇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色列正统派犹太人对与天主教进行对话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这种接触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时代》的发表距纳粹大屠杀只有25年,大屠杀带来的恐惧和阴影还没有消散,由于天主教传统上的“蔑视教导”合理化了纳粹暴行,所以犹太人对天主教还存有不信任,认为天主教寻求对话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劝导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尽管如此,1965年在以色列成立了一个宗教对话组织——“耶路撒冷彩虹组织”(Jerusalem Rainbow Group),这个组织在耶路撒冷定期举办活动(一个学年的七个月,每月一次),为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和宗教领袖提供对话的平台。但是这个对话只停留在学术层面,在两教的精英学者之间进行,影响力有限。

① 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1950年7月第一届以色列大使会议上作出了解释:“当国家建立时,我们面临三个问题:边境、难民和耶路撒冷。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通过外交力量和事实力量得到解决……应假定造成既定事实来解决这些问题优先于寻求外交途径……我们正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此事高于一切。”

② SIDIC, *Service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 Judeo-Chretienne*, No.1 (February 1967): 16.

③ 同上。



1991年马德里的中东和会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此为契机,梵蒂冈和以色列也正式建交。在以色列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律师们致力于促进和平进程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也给民间团体的对话活动带来了新的刺激,拉比、伊玛目、神父们开始引领人们进入一个对话的关系,旨在帮助其思考如何和平相处并采取具体行动。两国的建交可以被看作以色列犹太人对天主教态度转变的开始。2000年3月2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对以色列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历史性访问,这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正式访问以色列的教宗。在教宗的访问中,有两件事给以色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23日,教宗访问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并接见了来自他家乡波兰瓦多维采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演讲中,教宗向以色列人保证天主教会“对基督徒无论何时何地针对犹太的仇恨、迫害行为以及反犹太主义措施感到万分痛心。教会痛斥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①。3月26日,教宗独自站在西墙祈祷,并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将写有祈祷词的纸条塞进了墙缝里。因为以色列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自然少有机会接触同时代的天主教徒,教宗访问之前,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对天主教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的悲剧中。教宗的访问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犹太人对天主教的印象,他们发现天主教会不但不敌视犹太人,而且还寻求与犹太人建立更积极和尊重的关系。教宗的访问是以色列犹太人和天主教关系的重要转折,打消了犹太人的疑虑,扫清了两教对话的障碍。

2002年6月5日,以色列和梵蒂冈正式开启了官方层面的宗教间对话,双方商定由圣座“与犹太人宗教关系委员会”和以色列的两位首席拉比自200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会议,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两城交替进行。2004年1月16日,历史上教宗第一次接见了以色列的两位首席拉比,在会谈中教宗回顾了对以色列的访问并评价天主教会与以色列首席拉比建立的官方对话是“伟大希望的象征”^②。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自此有了更强烈的意愿与天主教进行对话,面对以前对话中不愿触及的宗教和神学问题,也有了更加开放的态度。创立圣座“与犹太人宗教关系委员会”和以色列两位首席拉比的对话机制也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对话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以色列的第一个对话中心,即“犹太教与基督教理解与合作中心”于2008年由埃弗拉特的首席拉比什洛莫·里斯金(Shlomo Riskin)创立,并于2011年发布了一份题为《犹太人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理解》的关于基督教的正统派宣言。^③在民间层面,2004年被誉

^① *The Saint for Shalom: How Pope John Paul II Transformed Catholic-Jewish Relations the Complete Texts 1979-2005*, eds. Eugene J. Fisher and Leon Klenicki (New York: Crossroad Herder, 2011), 331.

^② *L'Osservatore Romano* (January 17, 2004): 5.

^③ <https://www.cjcc.org/2011/05/24/cjcc-statement-on-a-jewish-understanding-of-christians-and-christianity/>.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为以色列犹太教—基督教关系领域的真正先驱的丹尼尔·罗辛(Daniel Rossing)创立了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关系中心(Jerusalem Center for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为应对圣地的犹太多数人口和阿拉伯基督徒少数人口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相遇所带来的挑战,通过课程、会议和研讨会致力于对以色列普通民众的教育工作。例如,2013年该中心开办了一个面向普通以色列人的教育活动,主题是梵二会议。^①通过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认识到了《我们的时代》宣言所带来的影响,以色列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对话也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二、美国正统派犹太人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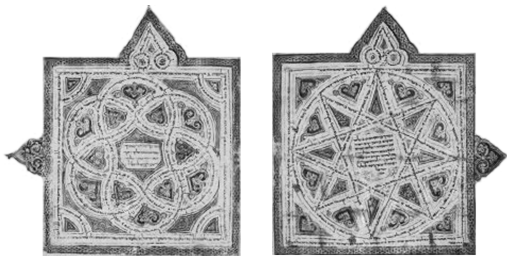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梵二会议召开时,圣座就邀请犹太人的宗教代表加入对话与和解的进程。面对来自罗马的邀请,美国正统派犹太人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是极端正统派的立场,认为与天主教的对话和互动会对犹太人的生存产生威胁而予以拒绝,犹太人只需要与非犹太人进行最低限度的接触,以防外来思想与价值观对犹太教的侵蚀,因为《希伯来圣经》里教导道:“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民数记》23:9)美国极端正统派律法权威拉比摩西·范斯坦(Moshe Feinstein)为这种立场奠定了律法基础。

在拉比范斯坦写给美国现代正统派权威拉比索罗维奇克(Joseph B. Soloveitchik)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反对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对话,指责天主教会寻求与犹太教对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阴谋——说服犹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并皈依基督教。改革派和保守派拉比以及一些年轻正统派拉比致力于与天主教的对话,无论其动机如何,最后都会导致犹太人的叛教行为。在他看来,为了保障犹太人的生存,与天主教徒及其代表进行隔离非常必要,宗教对话只会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不仅如此,拉比范斯坦将基督教视为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与基督教的对话会导致基督徒向“偶像崇拜的神”发誓,这是违反犹太律法的一种行为,因为犹太人是导致基督徒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近因。所以,尽管与基督徒进行关于世俗问题的对话,这种参与也构成了对禁止偶像崇拜附属品的严重违反。^②

^① 之所以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因为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天主教对犹太教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不仅如此,以色列还兴起了反基督徒的情绪,一小撮犹太极端分子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建筑搞破坏、涂鸦,向独行的基督徒吐口水。

^② 参见 David Ellenson,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A Jewish Legal Authority Addresses Jewish-Christian-Dialogue: Two Responsa of Rabbi Moshe Feinstein,”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Journal* 52 (2000): 118-122。



第二种是现代正统派的立场,拒绝神学对话的同时,允许就社会和政治问题与天主教进行接触。美国拉比理事会(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和犹太教正统派联盟(Union of Orthodox Jewish Congregations)代表了现代正统派的会众,这两个组织同时是美国犹太会堂委员会(Synagogue Council of America)的成员,美国犹太会堂委员会又是国际犹太宗教间协商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Jewish Committee on Interreligious Consultations)的成员,现代正统派在这些机构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拒绝神学对话也成为国际犹太宗教间协商委员会的官方立场。索罗维奇克拉比作为现代正统派的领袖及精神导师,为这种立场提供了律法基础。

1964年,作为美国现代正统派权威的拉比索罗维奇克发布了文章《对抗》。该文章划定了正统派与其他宗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对话方式和范围。许多正统派人士将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视作一个律法决定,是对一个特定宗教问题的权威回应。^①拉比诺曼·所罗门(Norman Solomon)称之为“索罗维奇克线”(Soloveitchik Line)。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描述了《创世纪》中人的三个层次,第二个部分论述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及与天主教对话的前提条件。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索罗维奇克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造人的记载解读为人存在的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

在第一个层次,人的形象是自然的人,与周围的存在是“非对抗”的关系;人与自然是连续的,受制于享乐主义而追求美和快乐;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从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中赢得自由的巨大能力,并将这种自由作为伟大的牺牲献给上帝。上帝希望人是自由的,以便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投入自己,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个层次的人表现出两方面的匮乏:没有认识到自己与自然的区别以及对“神圣的规范性召唤”的不敏感。这代表着那些未能将自己与外部环境区分开来的宗教团体,其成员觉得“不需要过规范的生活,不需要向更高的道德意志屈服来寻求救赎”,而是渴求“无限的审美体验”并且淹没在“事物和事件的一般秩序中”,过着一种既无尊严也无救赎的“非对抗”的生活。^②

在第二个层次,人处于“对抗”或“规范”的状态下。他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发现了一个令人敬畏的和神秘的事物和事件的领域,这是独立于他和不服从于他的领域……在这种发现之后,他发现了自己。由于这种自我发现与‘外

^① 参见 David Hartman, *Love and Terror in the God Encounter: The Theological Legacy of Rabbi Joseph B. Soloveitchik* (Woodstock: Jewish Lights, 2001), 132。

^② Joseph B. Soloveitchik, “Confrontation,”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Thought* 6.2 (Spring-Summer, 1964): 5-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在的‘非我’的对立，神圣的规范就诞生了”^①。这个层次的人发现自己要同时“对抗”自然和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技术工具性的，他的存在是为了完成造物主在创世第六天交给他的使命，“遍满地面，治理这地”^②。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模仿上帝的创造力来创建文化和社会是人的任务。这是人（第一亚当）存在的第一个维度，代表的是“自然群体”，由于对成功和胜利的强烈渴望而聚集在一起，目标是通过合作以获取更大的利益。^③ 而与现实的神秘性相遇，最终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上帝，这是人（第二亚当）存在的第二个维度。“第二亚当与上帝紧密结合”^④，代表的是“契约团体”，上帝是这个团体的“领导者、教师和牧羊人”^⑤。

在第三个层次，“主体”与“主体”之间平等地“对抗”。两个主体之间都因他者性和独特性而感到孤独，都被客观秩序所反对和排斥，都渴望得到同伴。这种面对是相互的，不是单方面的。这一次，两个面对者并肩而立，各自承认他者的存在。一个疏远的存在被转化为一个共同的存在。这是亚当和夏娃的“对抗”。

在勾勒出人的两个维度和三个层次之后，索罗维奇克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了犹太人与基督教特别是与天主教关系的问题。

索罗维奇克认为，犹太人同时属于人的两个维度，即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所代表的“自然群体”和“契约群体”，也就是人类和犹太人这两个共同体。面对第一个维度的挑战，犹太人有义务“与文明社会并肩站在一起，对抗一个藐视我们所有人的秩序……我们是人，致力于人类的普遍福利和进步，我们对防治疾病、减轻人类痛苦、保护人的权利、帮助有需要的人等事业有兴趣”^⑥。而在第二个维度，每个信仰者的团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信仰之语言反映了个人对其造物主的亲密、私密和矛盾地无法表达的渴望，以及他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这反映了一个特定群体的信仰行为的神秘性和陌生性，这对不同信仰群体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因此，宗教或神学的‘逻各斯’不应该被用来作为两个信仰群体之间沟通的媒介”。不仅如此，作为多数派宗教（基督教）与少数派（犹太教）之间的“对抗”不可能做到第三层次的“主体”与“主体”之间平等的对话，而是多数派凌驾于少数派之上的争论。据此，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交往应该限定在第二

① Joseph B. Soloveitchik, "Confrontation,"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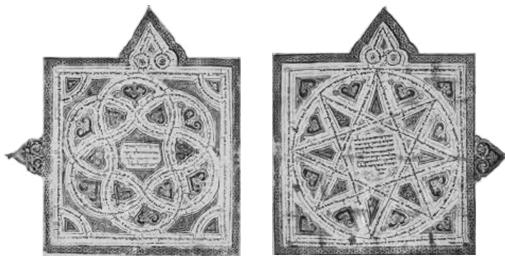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Joseph B. Soloveitchik, "The Lonely Man of Faith," *Tradition: A Journal of Orthodox Thought* (Spring-Summer, 1964): 16.

③ 参见 Joseph B. Soloveitchik, *The Lonely Man of Faith* (New York: Doubleday, 2006), 41.

④ Joseph B. Soloveitchik, "The Lonely Man of Faith," 22.

⑤ Joseph B. Soloveitchik, *The Lonely Man of Faith*, 43.

⑥ Joseph B. Soloveitchik, "Confrontation," 20-21.



层次,共同处理双方所面临的世俗问题,因为“在世俗领域,我们可以讨论要采取的立场、要发展的思想和要制订的计划。在这些问题上,宗教团体可以共同建议要制定的行动,也可以把握主动权,以后由一般社会来实施”。^①

最后,索罗维奇克规定了犹太教与天主教对话的四个前提条件。

(1)必须承认犹太民族是一个独立的信仰群体,被赋予了内在的价值,必须在其自身的元历史背景下看待,而不与另一个信仰群体(天主教)的框架相联系。

(2)与天主教的共同利益不在信仰领域,而是在世俗秩序领域。犹太人对上帝的唯一承诺以及对生存的希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不可商量的,也是不容辩论和争论的。

(3)犹太人应该避免天主教改变其教义,因为这种建议会导致天主教对犹太教的信仰提出相同的要求。改变应该依据天主教自己的信念行事。不干涉是良好意愿和相互尊重的必要条件。

(4)我们的历史肯定没有授权我们向另一个信仰团体(天主教)暗示,我们在精神上已经准备好修改历史态度,对基本的信仰问题进行利益交换,并调和“一些”分歧。^②

美国现代正统派拉比委员会(Modern Orthodox Rabbinical Council of America)在1964年发布的《关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与跨宗教对话的政策声明》中重申了索罗维奇克设定的“拒绝神学对话,允许在世俗问题与天主教进行接触”的立场,也标志着这个立场成为现代正统派的官方政策。不仅如此,索罗维奇克立场的影响力超出了现代正统派的范围,对整个犹太教正统派都有一定的约束力。正因为如此,正统派犹太人与天主教的接触非常有限。

三、犹太教正统派关于对话的反思和转向

梵二会议发布的《我们的时代》宣言肯定了基督教的历史渊源是犹太教,隐含地提到上帝和犹太人的约是永远的和连续的,强调宗教教育和正确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以及否定了对犹太人的“弑神罪”指控。以此为开端,天主教开启了与犹太教和解之路,两教的对话与合作也逐渐增多。

面对梵二会议以来天主教会的转变,犹太教正统派也逐渐开始反思“索罗维奇克线”的适用性。1974年,以色列正统派教授兹维·亚龙(Zvi Yaron)就批评了索罗维奇克的立场,认为其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世界地位的变化以及在现代世

^① Joseph B. Soloveitchik, “Confrontation,” 24.

^② 同上,21—2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俗社会中所有宗教都是“少数派”的事实。而且犹太教的地位在以色列国建立之后也发生了变化。^①而在美国,一些参与宗教间对话的正统派拉比正是拉比索罗维奇克的学生。比如,拉比大卫·哈特曼(David Hartman)作为索罗维奇克的学生就对其立场提出了异议,声称历史上的启示总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因此,不同信仰间的对话是当务之急,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信仰承诺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精神选择,没有人能够超越人类的有限性,理解上帝的无限现实。^②

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个事件标志着正统派犹太教关于对话态度的转变。

第一,2000年9月10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份犹太教声明《述真言——一个关于基督徒和基督教的犹太教声明》(*Dabru Emet—A Jewish Statement on Christians and Christianity*)。^③这份声明是由一群自称为“基督教问题研究犹太学者组织”(Jewish Scholars Group on Christianity)的犹太学者起草并发布的。他们认为应该就如何对待基督教的问题进行深刻和严肃的重新评估。不仅如此,此声明的发布更是为了重申自《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发表以来两教对话业已取得的进展,因为这种进展似乎正逐步被侵蚀。

犹太人对《述真言——一个关于基督徒和基督教的犹太教声明》声明的回应非常迅速,并且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一些拉比和学者持高度赞扬的态度,而另一些拉比和学者却尖锐地批评该声明。虽然有着不少批评的声音,还是有超过300位拉比和学者在声明上签字表示支持,其中就包括许多美国犹太教正统派重要的领导人。该声明是自梵二会议以来犹太教第一次就与基督教对话发布的相关神学声明,这表明犹太教内部已经开始反思“索罗维奇克线”的权威性。改革宗神学家莫尔特曼(J. Moltmann)在其所著的《俗世中的上帝》一书中一针见

① 参见 Zvi Yaron, “An Orthodox Jewish Israeli Views Interfaith,” *Face to Face* 2 (1977)。

② 参见 David Hartman,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from a Jewish viewpoint,” *Immanuel* 16 (Summer 1983)。

③ *Dabru Emet* (speak the truth)来自《圣经·撒迦利亚书》第8章16节的经文:“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至理判断,使人和睦。”声明全文如下:

(1)犹太人与基督徒同尊一位神。

(2)犹太人与基督徒同奉一本书——《圣经》(犹太人称作《塔纳赫》,而基督徒称为《旧约》)。

(3)基督徒能够尊重犹太人民对于以色列地所作出的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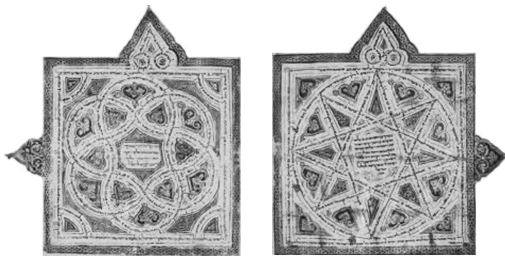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4)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接受《托拉》的道德准则。

(5)纳粹主义并非基督教现象。

(6)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以人力不可调和的差异将如《圣经》中所许诺的,在上帝拯救全世界时得到解决。

(7)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新型关系不会弱化(我们)对于犹太教义的遵行。

(8)犹太人和基督徒定要为正义与和平而携手。



血地指出犹太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单向性,即“犹太人从未问过任何问题”。^①《述真言》声明的发布意味着犹太教回避与基督教对话的态度有了转向。

第二,2003年11月23日,波士顿学院“基督教与犹太教学习中心”举办了题为“拉比约瑟夫·索罗维奇克关于跨宗教对话:40年之后”的会议,目的是讨论“在天主教会作出改变之后,正统派如何解读和应用拉比索罗维奇克的文章《对抗》中提出的立场”。

与会学者的意见分为两派:一种意见以阿里耶·克拉伯(Aryeh Klapper)为代表,认为天主教对话的意图值得怀疑,而且这种改变也不会持久^②;另一种是以尤金·科恩(Eugene Korn)的发言为主的态度,认为索罗维奇克的立场只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在天主教已经作出改变的情况下,与天主教的对话并不违反索罗维奇克拉比规定的四个前提条件。^③从对“索罗维奇克线”的争论可以看出,正统派内部已经开始反思自己传统上“不与天主教进行神学对话”的立场。但是,从这场争论也可以得出,仍然有三个“不平衡”阻碍着犹太教正统派与天主教展开对话。

第一个不平衡之处是双方的历史地位不同。犹太人是“受害者”,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将天主教的“蔑视教导”视为自己遭到迫害的根源,因此,天主教一方是“施害者”。犹太人对于过去的迫害和痛苦还记忆犹新,这种悲惨的记忆依然对当代的拉比和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他们不信任天主教的转变。拉比阿里耶·克拉伯对天主教的不信任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这也是阻碍犹太教和天主教对话的主要挑战之一。而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与天主教进行对话,正如犹太教与天主教对话领域的领军人物拉比里昂·克兰尼基(Leon Klenicki)所倡导的“犹太人的正确态度需要自我反省与和解精神……这需要承认对话伙伴是信仰的主体,是上帝的孩子。还要求认识到基督教在将上帝的盟约带给人类方面的作用,即《圣经》中象征人类的诺亚的义务。通过对话,基督教必须克服‘权力的胜利主义’,犹太教必须克服‘痛苦的胜利主义’”^④。

^① 参见 Moltmann 莫尔特曼,《俗世中的上帝》[Gott im Projekt der modernen Welt],曾念粤 Zeng Nianyue 译(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3),246。

^② 参见 Aryeh Klapper, “Revisiting ‘Confrontation’ After Forty Years A Response to Rabbi Eugene Korn,” https://www.academia.edu/24781589/Revisiting_Confrontation_After_Forty_Years_A_Response_to_Rabbi_Eugene_Korn。

^③ 参见 Eugene Korn, “The Man of Faith and Religious Dialogue: Revisiting ‘Confrontation,’” *Modern Judaism* 25 (2005): 306-309。

^④ Rabbi Leon Klenicki, “Nostra Aetate: A Jewish View ‘From Disputation to Dialogue,’” in *Transforming the Catholic-Jewish Relationship*, ed. Eric J. Greenberg (Anti-Defamation League, 2005), 1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第二个不平衡之处是基督教承认犹太教是其自我理解的源泉,而犹太教正统派的自我理解并不需要基督教的参与,甚至认为对天主教的神学回应是“对信仰问题进行的利益交换”。所以,对基督教的理解、学习以及与其对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事实上,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了解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基督教与犹太教互动的过程中,对犹太教有了更多的了解。希伯来大学的以色列·雅各·尤瓦尔(Israel Jacob Yuval)教授甚至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当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有相似之处,而又没有理由认为是两教的共同遗产时,可以认为这表明了基督教环境对犹太人的影响,而不是相反。^①虽然这个假设具有争议性,但是也说明了犹太教内部已经认识到,对基督教的学习和与其对话有助于更多地学习和了解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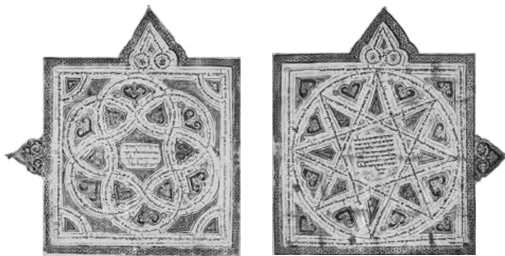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第三个不平衡之处是犹太教不像天主教一样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可以与天主教进行官方对话,并且发布对所有犹太人都有约束力的权威文件。“索罗维奇克线”是否还具有权威性和适用性就是这种情况的一种体现。因此,犹太教正统派一直未能发布一份类似于《我们的时代》宣言那样的犹太教关于天主教的官方声明。

四、正统派犹太教与天主教关系的新阶段:《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 和《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

2015年是《我们的时代》宣言颁布50周年,约书亚·阿伦斯(Jehoshua Ahrens)、伊茨·格林伯格(Irving Greenberg)和大卫·罗森(David Rosen)三位正统派拉比提议撰写一份正统派犹太人宣言,理由主要有四点:一是必须对《我们的时代》50周年作出犹太教的明确而强烈的反应;二是在过去几年,两教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部分原因是天主教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如严格拒绝了对犹太人所谓的传教;三是对以色列的一些反基督教行动作出反应,明确指出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不符合犹太价值观;四是想在对话中更进一步,并且重申犹太教的立场,特别是关于基督教的神学状况。^②

① 参见 Israel Jacob Yuval, *Two Nations in Your Womb*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21。

② 参见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venantal Partnership: Jews and Christians Reflect on the Orthodox Rabbinic Statement of "To Do the Will of Our Father in Heaven,"* eds. Jehoshua Ahrens, Irving Greenberg and Eugene Korn (Jerusalem: Urim Publications, 2021), 46-47。



2015年12月3日,正统派犹太教第一份关于犹太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声明《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发布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理解与合作中心”的官网上。这个声明的发布,标志着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两教关系历史性的基准,因为该声明是第一个由“领导以色列、美国和欧洲的社区、机构和神学院的正统派拉比撰写和认可的声明”^①。而且,102位来自欧洲(其中有7位是现任或前任首席拉比)、美国和以色列的正统派拉比在该声明上署名,涵盖了从开放的正统派到极端正统派的全部范围。这份声明迅速传播并且影响力巨大。

2017年8月30日,发生了一件对现代犹太教和天主教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来自欧洲拉比会议、美国拉比委员会和以色列首席拉比这三个犹太教正统派官方机构的代表向教宗方济各递交了《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的宣言。这个宣言虽然在《我们的时代》50周年纪念之后两年才发布,但也是对两教关系50周年的一个回应。这个宣言可以被视为两教关系的新的里程碑,因为这是正统派犹太教的官方机构第一次正式对天主教以及两教关系作出的宣言。

这两份文件对上述阻碍两教对话的三个不平衡之处作出了权威的改变。

第一,两份文件在开始提及了不堪回首的过去,指出“纳粹大屠杀使犹太人与非犹太邻居之间的关系降至历史最低谷”,这是犹太人对与天主教对话反应冷淡的历史原因。^② 接下来,两份文件都肯定了《我们的时代》发布以来,“天主教关于犹太教的官方教导有了根本的和不可逆转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教会的态度和教义的转变不仅是真诚的,而且是越来越深刻的”。^③ 因此,犹太教和天主教“正在进入一个各自信仰的成员之间日益宽容、相互尊重和团结的时代”^④。这表明犹太教正统派已经承认和信任天主教会的转变,犹太教已经克服了“痛苦的胜利主义”。

第二,犹太教正统派声称“既然天主教会已经承认了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永恒之约,犹太人就可以承认基督教作为我们伙伴在世界的救赎中持续的、具有建

^① 参见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venantal Partnership: Jews and Christians Reflect on the Orthodox Rabbinic Statement of “To Do the Will of Our Father in Heaven,”* eds. Jehoschua Ahrens, Irving Greenberg and Eugene Korn (Jerusalem: Urim Publications, 2021), 129.

^② 参见“Between Jerusalem and Rome: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Nostra Aetate,” <https://www.cjcc.org/2017/08/31/between-jerusalem-and-rome/>。

^③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venantal Partnership: Jews and Christians Reflect on the Orthodox Rabbinic Statement of “To Do the Will of Our Father in Heaven,”* 11.

^④ “Between Jerusalem and Rome: Reflections on 50 Years of Nostra Aetate,” <https://www.cjcc.org/2017/08/31/between-jerusalem-and-rom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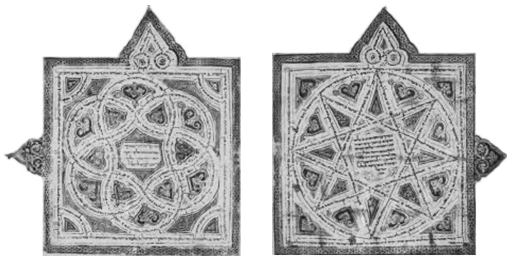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设性的合法性,而不必担心这被用于传教”。这句话就消除了第二个不平衡之处,犹太教神学给基督教分配了一个更加积极和平等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对话在犹太教眼中不可能再是“对信仰问题进行的利益交换”,而是为了“阐明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并且完成一个共同的盟约使命,即“在全能者的主权下完善世界,使全人类都呼求他的名,并将可憎的事物从地上抹去”。^① 二者无法单独完成这一上帝的盟约使命,对话与合作是“遵行天父的意志”的唯一道路。

从塔木德时代开始,犹太教为了处理外邦人与以色列的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发展出“双重盟约神学”的理论:犹太人需要遵守“西奈盟约”以及 613 条律法;而外邦人仅需要遵守“诺亚七律”就可以成为义人,在来世占有一份。对于犹太人来说,基督徒没有参与“西奈盟约”的资格,但是由于其与上帝的特殊关系,基督徒又不仅仅是遵守“诺亚七律”的外邦人。所以,犹太传统中,基督教的地位在犹太教神学里是介于“西奈盟约”与“诺亚七律”^②之间。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虽然拉比们对基督教的评价比之前更为积极,但对于基督教在“盟约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因此,《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里所称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的盟约使命”是犹太教正统派的一个神学突破,基督教在犹太教与上帝的盟约关系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不仅包括了道德行动,即在全能者的主权下完善世界,还包括了宗教行动,即使全人类都呼求上帝的名。这标志着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态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③,两教关系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

①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venantal Partnership: Jews and Christians Reflect on the Orthodox Rabbinic Statement of "To Do the Will of Our Father in Heaven,"* 13.

② Abraham Cohen 亚伯拉罕·柯恩,《大众塔木德》[Everyman's Talmud],盖逊 Gai Xun 译(济南 [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76。“诺亚七律”:做事公道,不得亵渎圣名,禁止偶像崇拜,禁止不道德行为,不得杀人,不得抢劫,不得从活的动物身上撕下肢翼。

③ 参见 Eugene Korn, “The People Israel, Christianity, and the Covenantal Responsibility,” in *Covenant and Hope: Christian and Jewish Reflections*, eds. Robert W. Jenson and Eugene Korn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157-158。拉比尤金·科恩将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态度分为四个阶段:(1)在 1、2 世纪,犹太基督徒在犹太社区里的存在是被容忍的,之后就被视为犹太教的异端或变节者。对耶稣是弥赛亚和“新约”的信仰被视为非法,是偶像崇拜。(2)在中世纪,因为基督教三位一体和复活的教义,许多拉比权威仍旧视基督教为敬拜上帝的一种非法形式。在这个概念下,基督徒被视为遵守“诺亚七律”,所以在技术层面上基督徒并没有违反禁止偶像崇拜的律法。(3)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生活在基督教欧洲的大多数拉比不再视基督教为偶像崇拜。他们规定,犹太人有义务相信绝对的一神教,外邦人并无绝对义务遵守“诺亚七律”的所有条款。因此,基督教成为外邦人信仰的一种有效系统。(4)从 17 世纪到整个 20 世纪,当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容忍度逐渐提高,一些拉比权威开始夸赞基督教是一种积极的历史现象和对外邦人而言不能拒绝的神学系统,因为基督教传播了犹太教的许多核心原则。



了索罗维奇克所称的“第三个层次”。

第三,《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和《耶路撒冷与罗马之间》的发布使犹太教正统派有了权威性的官方文件作为指导。如《遵行我们天父的意志》起草人之一伊茨·格林伯格所称,希望这两份文件对正统派犹太人的作用就像《我们的时代》宣言对天主教徒的作用。

结 语

在梵二会议之后,犹太教保守派、自由派、改革派和许多世俗犹太人是与天主教对话的先驱和倡导者。正统派犹太教对于与天主教对话的态度一直受到过去的反犹主义创伤的影响。所以,正统派的转变说明,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犹太教正统派的眼里,天主教不再是那个指控犹太人犯有“弑神罪”的敌人,而是为了完成“共同的盟约使命”的伙伴,进入了索罗维奇克拉比所希望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这并不代表从此之后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对话已经没有任何挑战,而是说两教对话中最主要的障碍已经被消除,双方可以就影响两教关系的神学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对话。